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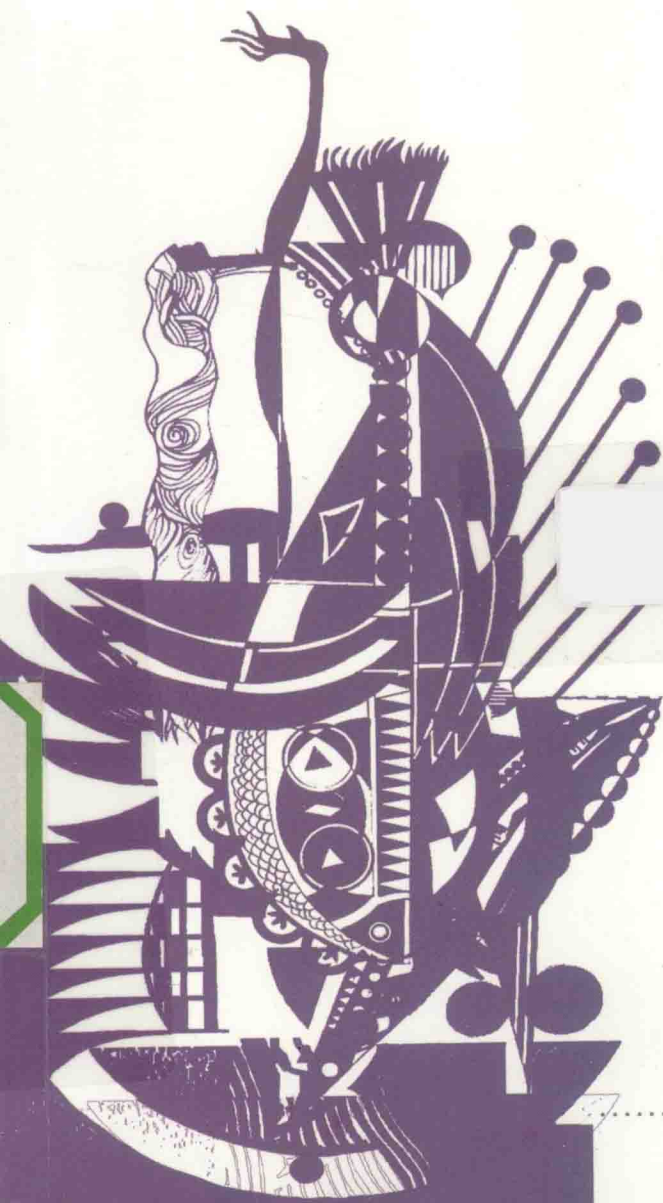


中國學研究

Sinology Studies

第十六輯

吳兆路 甲斐勝二(日本) 林俊相(韓國) 主編



中國學研究

(第十六輯)

吳兆路 甲斐勝二(日本) 林俊相(韓國) 主編

復旦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 主辦

濟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研究. 第十六辑/吴兆路,(日)甲斐胜二,
(韩)林俊相主编.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88-1066-7

I. ①中… II. ①吴… ②甲… ③林… III. ①汉学—
文集 VI. ①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2473 号

封面题字 冈村繁(日本)
责任编辑 朱向泓 朱 琦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邮 编 250002
电 话 (0531)86131727 86131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85×260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550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88-1066-7

中国学研究

(第十六辑)

学术顾问 王运熙 顾易生 王水照 潘富恩 黄霖 冈村繁(日本)
清水凯夫(日本) 崔溶澈(韩国) 杨端志

主 编 吴兆路 甲斐胜二(日本) 林俊相(韩国)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杜晓勤(北京大学)
方 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甲斐胜二(日本福岡大学)
雷恩海(兰州大学)	罗剑波(复旦大学)
朴均雨(韩国原州大学)	任元彬(韩国外国语大学)
孙明君(清华大学)	吴兆路(复旦大学)
张 兵(复旦大学)	

执行主编 丁少伦 吴兆路

责任编辑 朱向泓 朱 琦

封面题字 冈村繁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印刷监制 郭建业

卷首语

《中国学研究》自1998年创刊发行以来,得到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肯定,其影响远播世界各地。从本期开始,《中国学研究》重新改版,使之成为一种更加新颖别致、美观大气的专业性学术刊物。这是一种高档次、高品位且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专辑。当然,这类专辑的出版,如果没有国内外一些师友的积极鼓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恐怕是很困难的。值此,我们真诚地说声“谢谢”。

《中国学研究》所收录的论文稿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其撰写人员遍及世界各地,一般是博士毕业或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大学教师或专职研究人员,在中国留学即将毕业的国外优秀博士生的论文也在遴选之列。稿件一般由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送请有关专家预审。本专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旨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中国学研究》犹如一个窗口,为我们了解国内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一定借鉴。作为编撰者,我们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风格。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征集渠道还不是特别畅通,所以对有些优秀论文不能入选也深表惋惜。本专辑今后将注意扩大国别区域的覆盖面,增强精品意识,多发表一些功底深厚、富有创见、新颖独特的好文章,以繁荣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中国学研究》目前暂定为每年出版一辑,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稿件。稿件一般限于一万字之内,并请提供电子文档和打印稿,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国内联系人:吴兆路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邮编:200433)

E-mail: zhaoluwu@fudan.edu.cn

国外联系人:甲斐胜二

通讯地址:日本 814 福冈大学人文学部

E-mail: kaika@fukuoka-u.ac.jp



目 录

专家论坛

- 1 从中国古代诗歌看中国传统战争观 / 邵 青
- 8 倾听语音 超越语言
——桐城派的“精诵”论 / 吕美生
- 20 冯梦龙谐谑思想探析 / 孟 昕
- 30 中国古典小说观念的现代转换 / 梁 苑

文学思想理论研究

- 36 跨越言意“断玺”
——从隐喻视域论“象外之境”的生成逻辑 / 郭西安
- 46 《文心雕龙》“神思说”献疑 / 李 蒙
- 54 文学批评史视野中的《六一诗话》 / 赵鸿飞
- 62 论严羽《沧浪诗话》的诗歌创作论 / 谢卓华
- 66 “性情之正”下的《诗经》解读
——明永成间台阁诗人《诗经》观略探 / 汤志波

上古与中古文学研究

- 73 一花两果的同源神话 / 孙鸿博
- 79 《孝思赋》:梁武帝萧衍的自我书写 / 田丹丹
- 86 从《高士传》师友关系一探皇甫谧之政治理想 / 郑翠云
- 91 蔡伯喈形象新论 / 王 露
- 97 论李白的“孤独意识” / 马俊红
- 109 论李贺诗歌的意象创造及其产生的心理体验 / 于苗苗
- 116 秦观词之“词心”论析 / 李茜茜
- 123 宋人笔记中都城空间的重构 / 李启坤
- 130 苏轼祝文青词的人文精神与个人情怀 / [香港]严宇乐 *
- 136 “五山文学”:宋代文学花园的一枝幽葩 / 王汝娟

近世文学研究

- 142 元人方道颀及其《选唐诗》等著述探考 / 李 柯
- 156 元代散曲家盍西村的生平及其散曲创作研究 / 吴 晗
- 162 《水浒传》的伟大在于其民间立场与忠义情怀 / 张 宏
- 168 明代“后七子”之一梁有誉求学仕宦交游考 / 陈圣争

- 175 戴震《诗经》研究方法探微
——以《关雎》为例 / 赵玉琦

- 180 论钱大昕与方苞的时文
——古文纠葛 / 刘文彬

- 184 明清两代牡丹谱录考略 / 张千卫

现当代文学研究

- 193 女性主体与民族革命
——读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 杨 飞
- 201 流行的革命文学家及其身份困境
——谈蒋光慈的文学创作 / 杨飞
- 206 从冷酷到温情
——谈霍建起电影《暖》对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改编 / 王一琦
- 211 试论国际三大电影节 20 年获奖华语电影 / 温永至

语言学研究

- 219 近代汉语句末助词“裹”的来源辨议 / 梁银峰
- 229 《文始》初探 / 张虹倩
- 234 隐喻建构的认知心理研究 / 傅 佳 曹京渊
- 240 陌生化的实现方式: 辞格形成原理的审美维度探析 / 殷祯岑
- 244 小议“居然”的语法化 / 赵 静
- 249 关键词类新闻语篇的互文分析 / 宋姝锦(韩国)

文学文献与考证

- 258 “孔雀”起兴新证 / 赵 洁
- 265 齐武帝萧赜文学雅集述略 / 罗建伦
- 270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真伪之管见 / 孙文秀
- 277 唐代杨倞事迹考略 / 霍生玉
- 283 明陈霆生年考 / 侯荣川
- 287 《撝芳集》初探 / 陈启明

学术杂论

- 298 洛阳市辖区行政村落地名调查分析 / 李线宜 谷红欣
- 306 《良友》画报广告研究 / 王淑芹
- 312 咸丰时期督抚威势的扩张之我见 / 孔曙光 何召壮

海外中国学研究

- 322 “复旦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中心”建设的初步构想 / 黄 上
- 326 视域选择与审美转向
——18、19 世纪《诗经》在法国的早期译本概览 / 刘琳娟



从中国古代诗歌看中国传统战争观

●邵 青*

摘要:中国古代诗歌作为古人感怀与思考的结晶,呈现出独特的人文特征。反对战争,这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基本态度,也是卷帙浩大的中国古代诗歌所表达的最鲜明的一个主题。反对战争,不是盲目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态度鲜明地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支持正义的自卫战争,这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基本立场。农耕文化是产生中国古代独特战争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以“和平”“慎战”“防御”“自卫”为特征的战争观影响下的中国古代诗歌,深刻表达了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结束战乱、渴望和平是诗中流露出的共同心声。

关键词:中国 古代诗歌 传统 战争观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内容丰富、数量繁多,浸透了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其中许多诗歌内容与战争相关,描述了战争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影响,表达了人们对战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态度。本文拟结合中国古代诗歌,对中国传统战争观及形成原因作一浅析。目的在于透过中国古代诗歌这面镜子,探讨战争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对待战争问题的态度。

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鲜明态度

崇尚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基本态度,也是卷帙浩大的中国古代诗歌所表达的鲜明主题之一。透过诗人的笔触所表现出的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锦绣山川的赞美,与之相对照的是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强烈的反战情绪。

中国古人的这种战争观自《诗经》时代起就开始萌生。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相当一部分诗篇是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说明当时战争是很频繁的,其中主要反映的是周天子和诸侯的对外战争。在这些诗篇中,“西戎”“玁狁”“蛮荆”等少数民族经常作为战争对象出现,如: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旗,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大雅·江汉》)

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大雅·常武》)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小雅·出车》)

*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



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啍啍，啍啍焯焯，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小雅·采芑》）

这些诗歌多以歌颂天子、诸侯征伐御辱的军力强大、阵容严整为主，但其追求的终极目的并不是“霸道”，而是“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这种对外战争的心态深深影响着民族心理，在很多诗歌中，我们都能看到离家远征的士兵们并非倾心武力争斗，而是迫于外族入侵、家国倾覆而不得不奋起反抗，这就奠定了中华民族对战争态度的情感基调。

中国古代的战争，大都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的，主要表现为农耕民族抵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战争。这一类战争也是中国古代战争题材诗歌反映最多的内容。少数民族如《诗经》中经常提到的玁狁、秦汉时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的五胡十六国、唐代的吐蕃、宋代的辽金元、明代的满洲等等。

中华民族向来爱好和平，反对战争，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大量歌颂秀丽山川、田园生活的诗歌中看出，还可以从豪情满怀、抗敌御侮的战争抒怀诗篇中深深感悟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在击败项羽、一统天下之后所作的《大风歌》。刘邦在战胜西楚霸王项羽后，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在兴奋、欢乐、踌躇满志之余，他心中渴望的是怎样得到勇士去守卫国家的边疆，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守”字，道出了真意，诗中所表达的并非是对战争的赞美，而是对和平的向往。

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朵奇葩，边塞诗的源远流长也在于数千年来边关始终烽火不断。由于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接触与战争从未中断，反映边疆生活的诗歌也就从没中断过，这其中大多数的诗歌都是表现战争的。战争的频繁，更加凸显和平的珍贵。《饮马长城窟行》《古歌》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与对战争的怨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如唐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首诗以优美苍健的笔触，勾勒了边塞战事的漫长，抒发了对边境安宁的渴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热爱和平，渴望安定，但并不意味着害怕战争、畏惧战争，而是强调要慎重对待战争，不主动挑起战争；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要做好战争准备，从容应战。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其六）精辟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

诗的前四句，慷慨激昂，讲如何练兵用武，怎样克敌制胜；提出了作战步骤的关键所在，强调部伍要强悍，士气要高昂，对敌要有方略，智勇须并用，宛若总结战斗经验。然而从整篇看，它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而只是下文的衬笔。后四句才道出赴边作战的终极目的，强调要节制武功，力避杀伐，揭示“止戈为武”的本义。“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拥强兵只为守边，赴边不为杀伐。不论是为制敌而“射马”，不论是不得已而“杀伤”，不论是拥强兵而“擒王”，



都应以“制侵陵”为限度,不能乱动干戈,更不应以黷武为能事,侵犯异邦。这种以战去战,以强兵制止侵略的思想,反映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因为如无可靠的武备,就不能制止外来侵略;但自恃强大武装而穷兵黷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既主张拥强兵、做好防御战争的准备,又强调战争的目的在于卫国护疆,在于“制侵陵”,而非“多杀伤”,这正是中国传统战争观主要的观点。

坚持抗敌御侮的正义立场

历史上的战争就其性质而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正义战争,一类是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主要是指防御性的、自卫性的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国历史上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主要属于后者。中国古代汉族政权深受边境少数民族袭扰之苦,因此,态度鲜明地反对这种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支持正义的自卫战争,这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基本立场。中国古代诗歌中既有谴责侵略战争的诗,也有歌颂自卫战争的诗,充分肯定了抗敌御侮的战争的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对古人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褒扬。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秦风·无衣》)

《秦风·无衣》是一首慷慨激昂的从军曲,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它是产生于秦地(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人民抗击西戎入侵者的军中战歌。在这种反侵略的战争中,秦国人民表现出英勇无畏的尚武精神。

自《诗经》上述诗篇开始,写将士们同仇敌忾的爱国士气和慷慨激昂的战斗热情就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内容,诗中所流露的爱国精神、牺牲精神、英勇气概常见于后来战争题材的诗歌中。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栝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以来,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而献身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生于乱世,自幼即随父四方征战,受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豪情壮志的熏陶,响应时代召唤,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曹植的这首乐府诗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又激情四射、充满爱国情感的游侠形象,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抒写得淋漓尽致。诗歌描绘了游侠儿奋然而起,希冀立功边塞,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赞颂了游侠儿弃身报国、视死如归的崇高思想境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许多都表达了这种抛却个人情怀,立志舍身报国,杀敌立功的精神。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这首初唐诗人杨炯的《从军行》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

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场面。诗的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直接抒发从戎书生保边卫国的壮志豪情。艰苦激烈的战斗，更增添了他对这种不平凡的生活的热爱，宁愿做个下级军官驰骋沙场，为保卫边疆而战，也不愿做置身书斋的书生。唐代时，与此相类的诗篇比比皆是，如：“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抒发的是热血男儿身佩军刀、奔赴疆场的豪迈气概和收复关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马黄草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如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这首《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代表作之一。诗人通过描写大西北的奇异风光——狂风怒吼、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等刻画了行军作战的无比艰辛，有力地体现出唐军将士不畏艰苦、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乐观精神和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

长期以来，由于边塞烽火不断，立功杀敌的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往往在久燃不熄的烽火中变得慷慨悲壮，雄浑苍凉，但因其防御战争的正义性，仍然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这在唐宋战争主题的诗歌中表现得也尤为明显。

如王翰这首著名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表达了将士豪迈的痛饮场面和即将上战场时的雄壮悲凉。

又如王昌龄的《从军行》（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其中前两句从场景的辽阔、空旷、苍凉与距离的遥远来衬托战地环境的恶劣、荒凉，把战争气氛渲染得十分盈满酣畅；后两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既揭示了环境的艰苦、战争的残酷，又展现出将士们百折不挠、始终不渝的高尚节操。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岳飞《池州翠微亭》）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这首《池州翠微亭》，不仅表达了连年征战的艰辛与无奈，也写出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无限留恋，而这正是激励他枕戈待旦、精忠报国的不竭动力。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首诗深沉地表达了作者报效祖国的壮志和那种“年既老而不衰”的英雄气概与矢志不渝的精神。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戚继光《马上作》）这首《马上作》作于戚继光东南抗倭期间。透过铿锵有力的诗句，一个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他是紧紧与战马横戈联在一起，不能须臾分离的。这真实地反映了作者转战南北、紧张激烈的戎马生涯。

纵览中国古代战争题材的诗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诗歌里始终延续着激越昂扬的生命血脉，歌颂为国捐躯的勇武精神，无论是希冀“捐躯赴国难”（曹植《白马篇》），还是“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岑参《送人赴安西》），或是“只



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徐锡麟《出塞》),无不洋溢着正气凛然的精神风貌,而这也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闪亮之处。

强烈的厌战、反战之情

从《诗经》开始,中国诗歌史上就处处流露着对战争的厌倦,写满对战争的诅咒与控诉,还有因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而引起的忧虑和哀伤。在《诗经》的战争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控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不幸,发出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心声的。如《幽风·东山》《小雅·采薇》等通过写思妇怀远和征人思乡之情,出于对战争的感性直觉,侧重于从战争的破坏及给征人及其家人带来的灾难入手,表达对战争的憎恶及对和平的渴望,盼望早日结束战争。

《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写,历来被认为是古代边塞诗的开山之作。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诗中控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的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戍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末尾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将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凄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国时,一代枭雄曹操面对战争惊人的破坏力,也不免感叹:“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同情。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杜甫《兵车行》)

杜甫的这首《兵车行》客观展示了兵车经过咸阳桥的悲惨景象,反映了当时百姓面对战争的真实心态。全诗借出征的“行人”之口陈述其不得已出征的苦状。无论何种性质的战争,饱受摧残、惨遭重创的还是普通百姓,所以杜甫发出内心呼吁:“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行》),这也是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杜甫存诗一千四百多首,从前期的《兵车行》到晚期的《蚕谷行》,其边塞军事诗有近百首之多,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安史之乱”前后的种种社会现象。从杜甫的诗作中既能看到他对战争的控诉,也能看到他深切关注和同情遭遇兵燹之灾的百姓。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造成千万个家庭的悲剧。这首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描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通过新丰老翁叙述自己当年为躲点丁,用大锤折断手臂的遭遇,为了免征云南,不得不“偷将大石捶折臂”,“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却还要庆幸“一肢虽废一身全”,控诉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普通百姓对战争的厌恶之感。

中国古代诗歌中还有不少闺怨诗。由于边关烽火长年不熄，从军万里的征人难以回还，因此旷日持久的戍边、征战，不仅给广大的人民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也带来了精神的深重的离别之苦。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在大量优美的唐诗中，这首五绝成为特别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名篇之一。它取材单纯而含蕴丰富，意象生动而语言明快，引人入胜，耐人寻味，有深刻的时代内容。由于边事频仍，到辽西一带戍守的士卒往往长期不得还家，甚至埋骨荒陲。因此，广大人民希望统治者能够安抚边庭，使百姓过上安定团聚的生活。它以颇富民歌风味的清新的语言，通过一个意蕴丰富的动作性细节的描写，含蓄而又深刻地表现了广大人民在当时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所以最能拨动读者的心弦。它是一首怀念征人的诗，正面似写儿女情，实则却写征妇怨，反映了当时边塞战争背景下广大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首李白的《子夜吴歌》，选取了秋天女人在河边洗衣捣衣准备送给远征的丈夫这一常见的事，描写了留守女人的思念和愁怨。

“思妇哀”与“征夫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战争不仅破坏了人们创造幸福生活的幻想，更使亲人分离，夫妻天各一方，承受感情上的巨大哀痛。一旦征人们踏上征程，留守家中的妻子便立即被抛入无边的孤独与恐惧之中。等候丈夫归来便成为她们的精神生活。

高适的《从军行七首》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归万里愁。”诗人将征人思亲和思妇念远的双重情感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双重的情感力度，把这种双方互忆互念的痛苦心理描写得哀婉动人。

“晓笛别乡泪，秋冰鸣马蹄。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岑参《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诗歌中所渗透的思乡思亲之情，令人动容。

又如高适的《从军行七首》其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些长年戍守在边关的士兵，最易对月触景生情。戍边将士远离故土亲人，战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别家离亲的痛苦，使他们饱受了肉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折磨，更激起了他们对战争的厌恶与对和平生活的渴望。

因此，在以“和平”“慎战”“防御”“自卫”为特征的战争观影响下的中国古代诗歌，一以贯之的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思想，许多诗歌深刻表达了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巨难，结束战乱、渴望和平是诗中流露出的共同心声。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诗歌作为古人感怀与思考的结晶，呈现出独特的人文特征，完整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战争的认知。因此，徜徉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我们一方面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璀璨成就而自豪，另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中华民族如此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为何始终摆脱不了战争？几千年来，战争如同梦魇一样苦苦纠缠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与悲伤。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耕文化是产生中国古代独特战争思想的根本原因。华夏文明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农耕民族能够长期平和地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农耕文化造就了尚农、务农、孝亲、重养、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原始农业耕种对大量人力的需要,使得全社会都有一种对生命的珍视。这就形成了当时战争“不尚杀伐”的思想。只有社会稳定、与民休息,方可增产富国;战争作为一种对日常耕作的破坏力,非但不能使人们不能在日复一日的农业生产中获得安全感,而且易于造成百姓流离、无地为生的后果。再者,战争带来的徭役也会影响家庭劳动力的减少,使农耕生产难以为继。这些都是诗歌中反映的人们厌战、反战情绪产生的原因。与之相反的是,在中国西北部繁衍生活的游牧民族剽悍善战。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条件艰苦,向外掠夺是致富的重要途径,于是他们经常南下劫掠。他们所从事的侵扰战争有利可图,能够不劳而获,这给了他们侵略的动力。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无法“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因此,中原民族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当王朝处于积贫积弱的时期,便常常内忧外患蜂拥而至,战争与杀戮不断。

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在继承先辈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前进的,今天是由昨天发展来的,有着明显的历史继承性。战争观作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不例外。今天我们国家在战争问题上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于对过去传统战争观的继承。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与过去已经有了显著不同,中国正在从传统农耕国家向现代海洋国家转型,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根本性改变,作为对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反映,战争观也将发生改变,将会增加更多积极的内容,如更加强调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重要,更加重视对国家民族利益的捍卫等。

倾听语音 超越语言

——桐城派的“精诵”论

●吕美生

摘要:“义法”是桐城派理论的基因和起点,“雅洁”则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和艺术风格。“雅洁”作为“义法”在语言层面上的艺术体现,“精诵”则是“雅洁”在语音层面上的审美接受。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到姚鼐提出“精诵”论,表现为桐城派几代人薪火传承的文学景观。“雅洁”需“精诵”的外响,“精诵”需“雅洁”的内蕴,两者形成艺术审美之张力。“精诵”论,是从“流块建构”的象形字的“音美”符号中所提炼出来的艺术法则。“精诵”论,更是从读者审美心理的瞬间生成中总结出来的语感文化。

关键词:义法 雅洁 精诵 节奏 以声求气 陌生化

西文是“音本位”的拼音文字,它是呈“时间性”,是“线型”的;汉文则是“字本位”的象形文字,它呈“空间性”,是“场型”的。汉字的特点不是“关系框架”,而是重在“流块建构”的表意性的象形方块字。闻一多曾指出:“唯有象形的中国文字,可直接表现绘画的美。西方的文学变成声音,透过想象才能感到绘画的美。”^①鲁迅更提出汉字“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②即审美心理功能的建构,感心是目的,感目和感耳作为“中介”是手段。而目的是通过手段来与客观现实直接统一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汉字改革——简化字。这确乎使汉字绘画般的形美有所逊色和退化。但这是历史大变革时期所必然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和难以挽回的缺失(港台地位仍沿用繁体字)。是非得失,千秋功罪,自由后来人评说。

现在我要强调的是,抓紧汉字“音美”,不能再让它隐匿和流逝。如西蒙斯所言:“为了唤醒语言建成的宫殿,音乐般的升起来。”^③在这方面、桐城派的“精诵”论,可谓是我们理应继承的非物质优秀语境文化遗产之一。

(一)

“义法”是桐城派的理论起点和基因。方苞指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文体是审美感知的最初源泉;文体是艺术魅力的瞬间生成。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它是通过义经法纬,即物序交织,逐步嬗变、上升为“雅洁”化文学语言。这里有一个经由方苞的服膺“文以载道”,即内容决定形式的二元论,逐步演进为形式即本质而且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本体论、语言本体论的历史过程。这也就是说,按照艺术辩证法,它是经由形式的相对能动反作用,逐渐演进为形式的主动重建审美功能作用。作为文学语言的“雅洁”,它必然是思与诗的对话,因而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与艺术风格。方苞虽然首创并标榜“雅洁”语言的“形色



之美”,但并未达文体学的高度。如说:“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古文约选序》例),因而只是要求“特用为彩色声音之助尔”。(《晋祭斐太常文后》卷五)这与他认为“盖古文之传与诗赋异道”(《答申谦居书》)的偏颇识趣有关。到了姚鼐则认为“诗之与文,固是一理,而取径则不同”(《与王铁夫书》)。可见二人显然在文体上审美视野有分歧。方苞认为“艺术莫难于古文”(《答申谦居书》)。如果说,“雅洁”论是“义法”论在语言层面上的艺术体现;那么,“精诵”论则可说是“雅洁”论在语音层面上的审美音响。我们在“精诵”时,必然是时间统领着空间,也就是将空间置于生动活泼、节奏不息的生命之流中,并赋予艺术生命以流荡而生动的气韵。“精诵”论,凝聚着语言层面的美质乐感,动态地表达着富于暗示意味、超越时空、触发幻想的韵律感,呈现着人的诗性存在的澄明之境。正如王士禛所言,“善读诗者,由声以考义”^④。“精诵”论,是姚鼐弟子方东树在其身后所总结出来的,有关“雅洁”美学境界的一条艺术规律及其法则。如说:“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于精诵,沉潜反复,讽玩之深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距、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深而法,达而臧。”并认为“精诵”的特质高妙处是“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语人者,实在于此”。^⑤而这一“精诵”论,从姚鼐开始,却合乎历史和逻辑地成为桐城派几代人薪火传承的文学景观。其实,早在这之前,就有“传其义法,而才调独出”^⑥的刘大櫟,曾首创“以品藻音节为宗”之说。^⑦他暗合接受美学理论,即强调诗人创作,要求冲出、突破所指语言的僵硬概念,提出以“音节”为中介的“神气、音节、字句”(《论文偶记》),三者多元互动的取向和视角,进而建构为“因声求气”的“神气”论,就是“诗成于音,音成于声”。“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论文偶记》)这就是强调在捕捉和彰显生机勃勃的精神、气脉时,把它视为文学的本真的诗性存在,把传达、超越有限形象的无限神气,视为诗文创作的艺术平台和文化坐标。姚鼐是在批判地继承方苞的“义法”和刘大櫟的“品藻”之基础上,建构“雅洁”论的。正如方东树所言:“要之,不知品藻,则其讲义法也慙;不能义法,则其貌夫品藻也滑耀而浮。知其长,济其偏,止其敝,此所以配为三家,如鼎足之不可废一。”^⑧这是“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⑨姚鼐的“识胜”,表现在把方苞义经法纬、物序交织的“雅洁”论,以刘大櫟“神气”说充实之,视作扬弃的中介环节,从而解构为“否定之否定”,即正、反、合的辩证历程。这样,终于把方苞“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书萧相国世家后》)即只具“现象具体性”的“雅洁”论,历史地逻辑地演进为具有“思维具体性”,即“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⑩这就是姚鼐“多样的统一”的“雅洁”论,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超越了传统“文以载道”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把方苞“文质半取”的二元统一论思维模式,嬗变为“形式乃是感性的整体性。由于它赋予对象以形式并使之存在,因而可以说,形式既是意义,又是本质”^⑪的艺术本体论。这也就是说,姚鼐把方苞的“义经法纬、物序交识”,形式服从内容的二元文论模式,逐渐解构为“为文者八”即由粗寓精、御精遗粗的语言本体论的艺术审美模式。于是他把“神理气味”和“格律气色”的八个音响符号的结构逻辑功能,视为诗文艺术生命的本质特征。这是把能指的音响符号视为是隐喻语言的媒介,又转换成生命脉息的载体。马克思指出,“形式如果不是表达其内容的形式,就没有任何价值”。^⑫“雅洁”就具有包蕴“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多样的统一”的符

号学隐喻意义。这就是说,由方苞的义经法纬、物序交织的“雅洁论”,艺术整合为姚鼐的遇粗进精、御精遗粗的“雅洁论”。这是一个语言本体论、形式本体论的根本转变与文化换型。正如姚鼐所言:“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这也是一个诗文创作合乎艺术规律的审美生成问题。宗白华说:“中国艺术‘是诗意的创造性空间,趋向于音乐境界,透渗了时间节奏。’”^⑬而“精诵”作为“雅洁”在语音层面上的艺术敞亮建构,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论点。姚鼐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与陈硕士》)“疾读”而又“缓读”但决不止于“默看”。就是要求做到“瞻于目,诵于口,而书于手”(《复汪进士辉祖书》)。耳、口并用,口作为“中介”,而成于手,始有“雅洁”化文学语言。正如其弟子梅曾亮所言:“夫观书者,用目一官而已,诵之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⑭这就是“精诵”论的要诀和精义。

方东树称赞姚鼐“托于笔墨净洁而精微”而“尤以识胜”。^⑮姚鼐也自称“当以笔墨识趣为主”。(《与伯昂从侄孙》)这显然继承了严羽的“以识为主”的诗学观。严羽说:“夫学诗当以识为主……必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之为之本,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⑯其实早在唐朝,李德裕在《文章论》中,对曹丕《典论·论文》所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曾发出这样的赞叹:“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窥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之者不厌。”^⑰这种“希声窥眇”和“洄洑逶迤”的声音美感的艺术整合,正是姚鼐强调“从声音证入”的思想资源。姚鼐从“声音证入”到“久之自悟”,与严羽所言“朝夕讽咏”到“自然悟入”的见解,完全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姚鼐还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与陈硕士》)又说:“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与石甫侄孙堂》)可见其强调“从声音证入”而“精诵”的一贯识趣,终生不渝。姚鼐这种“从声音证入”的艺术建构,和沈德潜所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⑱是声息相通,互为别响的。因为张裕钊曾指出过,姚鼐目视韩愈《送董邵南渡河北序》一文之首句,为体悟其“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的微妙兴会处,曾“每诵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⑲据传由于他气羸,故不得不在精诵时“抑其声使之下耳”。^⑳然而,张裕钊还指出:“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一不废哦诵。”^㉑正如《文心雕龙·声律》曰:“声含宫商,肇自血气。”而“精诵”的声韵节奏并非生物性的纯物理现象,它实质上是人的内在生命律动的闪亮证明。这是诗与思的对话,是诗性生命在话语结构中富有乐感的流露和回响。它具有超越所指语言概念,即能指音响符号的语言文学的本质特征。因为文学语言的“雅洁”之美,必须从“精诵”中才能获得。

姚鼐这一关于“精诵”论,即背诵朗读文学语言的宝贵艺术经验,曾被自称“国藩以粗解文字,由姚先启之”^㉒的曾国藩所发扬光大之,他认为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情韵不匮,声调铿锵。”是“文章中第一妙境”,认为“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己,庶渐渐可入佳境”。^㉓他强调要在“声响”上下功夫,强调“熟读成诵……自有悟境”。^㉔他在《曾文正公家训》中,谆谆告诫其子弟:“凡作诗,最讲究声调。先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两者并进,